

加藤春城與日治時期臺灣的「國語」教科書

文·圖片提供／陳虹彬（日本平安女學院大學准教授）

加藤春城（圖一）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編修官，曾任文教局編修課課長，負責當時教科書相關政策的執行與實際的編輯工作。所謂的「國語」教科書，指的是日治時期臺灣學生所使用的日語教科書，其內容反映了當時總督府在臺的教育方針。加藤在臺灣參與了27年的教科書編輯，負責過數十種以上由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學校教科書。



▲圖一：加藤春城（最上排右起第三人）與友人的家族聚會。（攝於芝山巖，家屬提供）

的部分。由於日語並非臺灣學童的母語，所以加藤認為初級日語的教學應以利用實物與教授讀音為主的直接法進行。但對於使用直接法所產生諸如過分偏重兒童記憶力等缺失，他則主張透過指導方式的強化與教科書的編輯手法來做修正。是故，加藤所編輯的初級日語教科書，便有著重視自兒童日常生活中取材、首度引進使用大而美的彩色插圖，以

及不拘泥於初級教學就開始導入政治性教材、重視教師用教學資料的研究與公開等幾項特色。

以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為例，加藤在第一篇教材就導入無文字的跨頁彩色大插圖，內容皆取材自臺灣學生的實際生活畫面，這樣的編排無論在當時日本本土或臺灣都是一項創舉（圖二、圖三）。加藤說過，插圖是比文字還要能表達內容的教材，所以在選擇上更要做特別慎重的考量。用交談與文字中都無法充分傳達的內容，透過插圖，反而可以準確傳達的情況並不少。不過他也同時指出，純插圖教材若沒有明確的教學方案，則易流於單純的繪畫或裝飾性的存在，故除了要考虑從日常生活取材外，並應確保教學者

其中又以臺灣人所讀之公學校所使用的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以及第五期的國民學校「コクゴ／初等科國語」最具代表性。爾後因戰爭局勢加劇，臺灣用的教科書無法再送至日本印刷，加藤便於1942年辭去總督府職務，轉而投入建立臺灣教科書印刷事業的工作，是日治時期與臺灣教科書關係最密切的人物之一。此次筆者將把討論的重點放在加藤對「國語」教科書所持的理念，以及他所主導編輯之臺灣「國語」教科書的特徵上。

加藤自1906年年末來到臺灣，有將近40年時間都從事於臺灣教育相關工作。不同於其他的殖民地教育官僚，在臺灣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加藤重視將實際教學經驗應用在教科書的編輯上，尤其是低學年教材



▲圖二：第四期國語教科書「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開卷首篇連頁全彩色插圖教材。（玉川大學教育博物館所藏）



▲圖三：第四期國語教科書「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全頁插圖教材。（玉川大學教育博物館所藏）

能充分掌握教學方式與教材的重心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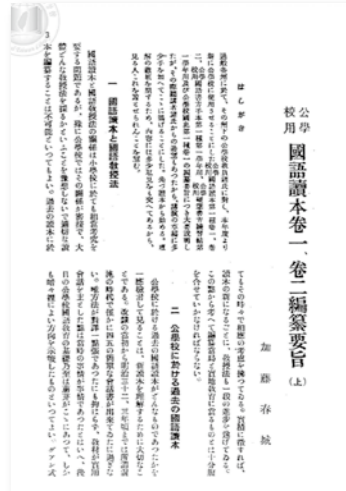
此外，加藤也主張初學階段不須堅持使用「政治性」教材這點，他認為國民精神涵養之相關教材雖然必須重視，但從一開始就大量使用的話，反而會造成學習上的障礙，所以他主張能使用日語教學就算是「國民精神的涵養」。而將來只要學生能確實習得日語，自然也就會出現「親日的傾向」。只不過，不帶「政治性」的教材，就更需要教學者肩負起引導的責任。換句話說，無論是要彌補間接法教學的缺點或確保教材能被正確使用，「教師」始終是加藤心中落實殖民教育重要的一道防線。是故，加藤在編輯教科書時重視到學校實地訪查，並會在教科書出版之後舉辦以教師為對象的說明會，並在事後將內容刊出，足見其不只重視教科書該怎麼編，也同時重視要怎麼用（圖四）。

關於當時日本的國定教科書是否直接適用於殖民地臺灣這點，重視實際教學面效果的加藤始終認為，教科書編輯必須考量教學對象來做改變，包括教育的目的與背景、特殊的區域、特殊的環境條件、對象的性格思維與風俗習慣等，不是那麼容易就能以同一套教科書來適用所有情況。

督府編修課自行編輯的教材一直占有約七成的比例。不過，我們要了解的是這個比例並不是因為總督府尊重臺灣的特殊性與自主性而來，而是以達成大日本帝國的目標為優先考量的取材基準。包括以臺灣特有風俗民情為題材的教材在內，其實都隱含了透過學生所熟悉的事物來進行日本國民精神教化與同化的重要功能，而不是以「臺灣人的利益」為基礎來進行編輯的。

像加藤這樣主張為臺灣「量身打造」的教科書，或許在語言文學的訓練比不上

國定本，但在精神教育上來說，其實是比直接拿國定本來教學更有效果的。就動機與目的而言，越是強調配合臺灣量身訂做的教材，最終才是真正具有精神制約與強制性意義的教材。



▲圖四：刊登於《臺灣教育會會刊》「臺灣教育」中的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